

循证政策：研究内容、主题框架与未来展望



□王 磊 田海容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 266100]

[摘 要] 关于循证政策的研究正处于公共管理方法与理论的前沿位置。为完整展示该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本文采用系统文献综述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对循证政策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循证政策的理论研究、技术在循证政策中的运用机制、基于循证理论的政府决策问题、循证实践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的运用，这四个部分组成了循证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循证政策形成的大致思路，即“数据—信息—证据—实践”的过程，并非只存在单向运行的情况，还蕴含着反馈、转化和助推的方式。对此，本文提出了循证政策的主题框架，并围绕两大问题，分为四个研究内容展开探究。本文进一步从政府循证治理、融入当地文化、技术赋能循证、证据分级量化这四个角度提出了未来展望。总之，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帮助学界掌握循证政策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 循证政策；公共管理；研究内容；主题框架；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 G353.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71/j.1008-8105(2023)-5008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循证政策研究属于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有助于推动和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探索循证实践对处理公共政策问题的影响，这是循证政策研究的基本方面。简言之，循证政策是以证据为核心的政策，并与政府决策、政策出台等内容紧密相关，例如：有学者梳理了美国联邦政府循证决策的最新进展以及对我国在实践中理解并推行循证决策的启示^[2]。所以，研究循证政策不仅可以帮助学界掌握循证政策的理论现状，还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据—证据—政策”是新型政府循证决策模式

遵循的基本逻辑^[3]。有学者通过案例研究证明，“基于循证决策理念的智库决策路径能够优化决策过程”^[4]。也有学者从新兴技术的角度探索循证政策实施的可能性，例如：技术赋能循证^[5]、以算法拯救循证^[6]等。还有学者探讨了企业财务风险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循证决策问题^[7]。伴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循证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往往与高新技术相联系，例如：有学者基于循证决策理念，探讨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构建^[8]。循证政策与各种前沿科技和理论紧密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在循证政策产生、贯彻和实施的过程中，这种基于证据的思想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指导和帮助。例如，有学者基于政策全过程的分析视角，分析如何避免公共政策失败，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构建基于循证决策的整体性决策体系^[9]。

对此，本文重点回应以下问题：（1）循证政

[收稿日期] 2023-03-21

[作者简介] 田海容，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 王磊，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2091351088@qq.com.

[引用格式] 王磊, 田海容. 循证政策：研究内容、主题框架与未来展望[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4, 26(2): 84-92. DOI: 10.14071/j.1008-8105(2023)-5008.

[Citation Format] WANG Lei, TIAN Hai-rong. Evidence-Based policy: research content, thematic framework and future prospects[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 26(2): 84-92. DOI: 10.14071/j.1008-8105(2023)-5008.

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大体可分为哪几个部分，又可以构建怎样的主题框架？（2）循证政策形成的大致思路，即“数据-信息-证据-实践”过程又是如何生成？（3）循证政策的未来展望又是如何？本文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重点探究“循证政策”这个更为丰富和饱满的概念，采用系统文献综述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①对循证政策研究成果进行总结，通过编码结果，得到循证政策的主要研究内容。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循证政策的主题框架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方法

为完整展示循证政策领域的前沿研究，本文采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对国内外循证政策现有成果进行整理。目前，国内顶级刊物上刊发的论文在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时，首先对文献进行检索与筛选，然后通过简单的文献计量工具（使用VOS Viewer等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接着对文献进行编码与绘表，最后对可视化结果和编码结果进行归纳与总结^②。对此，本文借鉴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具体步骤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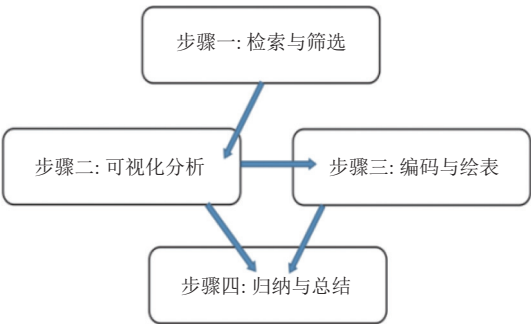


图 1 步骤与方法

步骤一：检索与筛选。

一方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CSSCI（含扩展版）期刊与北大核心期刊的文献检索时间为2022年11月12日，检索主题设置为“循证政策”^③，时间为2000~2022年^④，检索类型设置为学术期刊，共检索到249篇相关文献。为保障文献资料与研究主题契合，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通过人工删除关联度相对较小的26篇文献，最后获得223篇文献。另一方面，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集中的文献检索时间为2022年11月12日，检索主题设置为“Evidence-Based Policy”，时间为2012~2022年^⑤，检索类型设置为“高被引论文”or“热点论文”，领域为“All Fields”，经人工筛选后得到324篇相

关文献。

步骤二：可视化分析。

使用CiteSpace 6.1.R3软件对国内外循证政策研究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分别得到合格记录222条（国内）、322条（国外）。由图2、3可知，国内“循证政策”研究的热点话题主要集中在循证决策、循证实践、循证医学、循证、循证政策、循证教育、卫生政策和大数据等方面；国外“Evidence-Based Policy”研究的热点话题主要集中在随机对照试验、卫生保健、系统综述、政策、公众健康、影响、护理、干预和心理健康等方面^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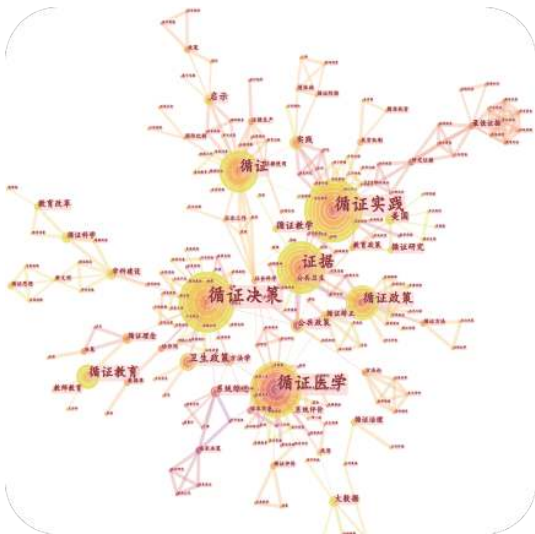


图 2 国内“循证政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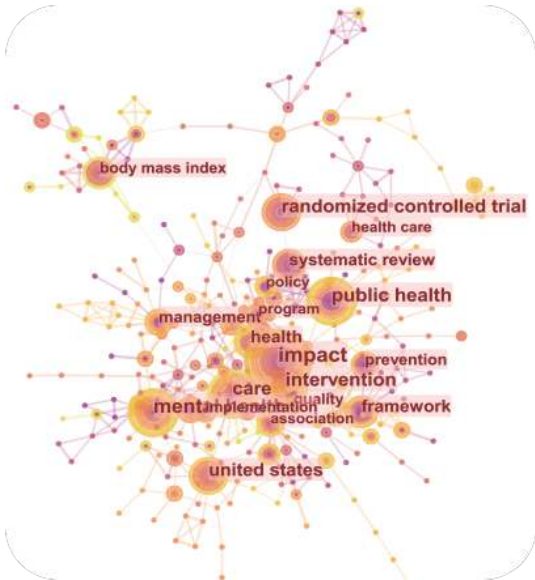


图 3 国外“Evidence-Based Policy”研究的关键词共现

步骤三：编码与绘表。

结合CiteSpace 6.1.R3软件分析结果，再借鉴刘善仕等（2022）^⑦的编码方式，本文提取了文献资

料的主要内容,得到此次文献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编码结果可知,研究内容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循证政策的理论研究、技术在循证政策中的运用机制、基于循证理论的政府决策问题、循证实践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的运用。

步骤四:归纳与总结。

根据CiteSpace 6.1.R3软件分析结果和研究文献编码结果,本文形成了一个对循证政策研究范围的基本理论轮廓,通过深入阅读代表性文献,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对循证政策的具体研究展开分析,进一步总结研究内容,最后基于研究内容得出了循证政策研究的主题框架,基于此提出未来展望。

二、研究内容

(一)循证政策的理论研究

循证政策缘起于实证科学,强调用科学方法获取的客观、连续和系统化的证据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10]。随着循证思想在医学领域的深入,医学问题同样重视证据的作用,循证医学也得以发展。关于循证政策、循证决策的发展,有学者梳理国内外现有文献后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循证决策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发展得益于循证医学的成功和突破”^[11]。1999年,英国政府在《政府现代化》白皮书中明确指出期望政策制定者更好地利用证据和研究的方法来制定政策^[12]。21世纪以来,其他国家也逐渐重视循证政策的研究。正如表1所示,从循证政策的理论研究来看,国外定性研究比较成熟,内容包括:循证政策挑战、循证政策方法、循证政策批判、循证政策相关性等。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重要内容:辩证看待假设、证据分类挑战、多种研究思路。

1. 辩证看待假设

在一定程度上,循证政策研究的假设条件,可能受人们主观判断的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循证政策研究中的通常假设(政策制定者不使用证据,且使用更多证据将使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受益)并没有得到证据支持和验证,导致许多这类研究存在偏差^[13]。所以,在学术探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辩证地对待这类假定条件。再比如,循证医学不仅是循证实践的基础性研究,更是应用性研究,其中心前提是“基于证据层次较高的研究设计的循证决策比基于证据层次较低的研究设计的循证决策更可靠”^[14]。在这一过程中,医学工作者也同样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些前提和假设方面的问题。由于医学领

域对于证据的要求较高,医生必须严格依据所掌握的病人的情况,对照以往的病历史,从而对症下药,解除病人的痛苦。除此以外,医学工作者不仅要辩证看待研究假设,还可以通过提供明确的概念来指导工作,例如:有学者分析了循证实践能力的概念,认为给出清晰且可操作的定义,将有助于指导不同经验水平的护士使用现有的最佳证据,从而提高护理质量^[15]。

2. 证据分类挑战

在循证政策实施过程中,实际工作内容往往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譬如证据分类挑战问题。这一过程对证据的分类可能相对不易把握,特别是循证问题的证据分类标准。尽管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确保通过更严格和更具挑战性的证据基础来制定政策和实践^[16]。在循证政策推行过程中,为充分发挥证据的作用,政府需要提供更有效、更高质量的服务。这一过程可能会因其他干扰因素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关注影响循证政策证据的各种因素,使政策的制定更具客观性。

3. 多种研究思路

循证政策研究具有多种分析思路。例如,Pawson R通过对“元分析”和“叙事评论”这两方面逻辑性的考察,讨论关于将过去研究成果整合到政策过程中的最佳策略^[17]。目前,循证理念在实践中的运用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内容主要以循证医学为中心,并向其他领域(如:公共政策领域、医疗领域、教育领域、卫生领域等)发散和拓展,形成中心-发散式形态,成为一种跨学科包容型结构,如图4所示。该结构内核稳定,但发散的边界尚无固定界限。其核心是循证医学,以公共政策领域、医疗领域、教育领域、卫生领域为主要发散空间,当然这一过程也涉及其他相关的领域。这种跨学科包容型结构可以涵盖多种学科背景,充分发挥学科之间长处优势,做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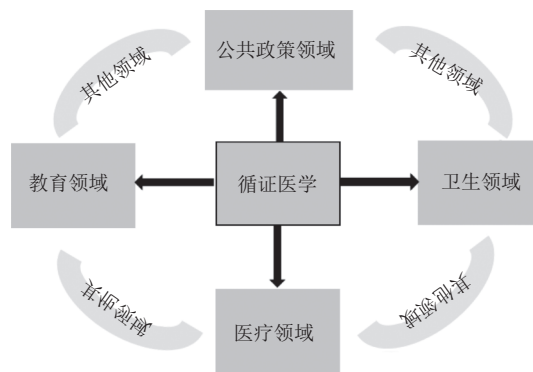


图4 跨学科包容型结构:中心-发散式

表 1 循证政策研究的代表性文献编码结果

研究主题	代表性文献					
	标题	作者	文献来源	研究方法	研究发现	
循证政策的理论研究	循证政策挑战	A Challenge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	La Caze A, Colyvan M	<i>Axiomathes</i>	定性研究	决策所需的证据不容易用于随机对照试验，也不容易被列在一个单一的通用层次中。
	循证政策方法	Evidence-based Policy: In Search of a Method	Pawson R	<i>Evaluation</i>	定性研究	通过将研究系统评论的两种主要策略：“元分析”和“叙事评论”的逻辑，加入了讨论。
	循证政策批判	New Directions in Evidence-based Policy Researc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Oliver K, Lorenc T, Innvær S	<i>Health Research Policy and Systems</i>	定性研究	EBP研究通常假定：政策制定者不使用证据，且使用更多证据将使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受益。该研究则认为，这些假定并没有得到支持和验证，导致许多这类研究存在偏差。
	循证政策相关性	Evidence-based policy: What’s to be done about relevance? For the 2008 Oberlin philosophy colloquium	Cartwright N	<i>Philosophical Studies</i>	定性研究	为了说明哪些事实与判断政策有效性相关，需要构建政策执行时会发生的因果情景。
技术在循证政策中运用机制	技术赋能循证	技术赋能循证：人工智能驱动政府循证决策范式变革	张红春，杨涛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定性研究	技术为循证决策价值与证据的生成、融嵌提供支持力。
	以算法拯救循证	以算法拯救循证：“知识—权力”结构下政策终结的话语空间	曲纵翔，董柯欣	行政论坛	定性研究	算法技术依托大数据与计算的原理令其可能成为政策终结的可用技术工具。
基于循证理论 的政府管理问题	政府循证决策	政府循证决策：美国联邦政府的实践及启示	杨开峰，魏夏楠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定性研究	美国政府的循证决策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模式。
	智库证据分级	基于循证决策理念的智库证据分级与决策路径建构	冯佳昊，陈安	中国科技论坛	理论与研究案例验证相结合	基于循证决策理念的智库决策路径能够优化决策过程，其输出的方案具有科学性。
	企业财务风险	企业财务风险与产业结构调整 的循证决策研究	周曙光，王诗雨	中国软科学	定量研究	经验证据体现了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在风险管控与效率提升方面的互补效应。
	公共政策失败	公共政策失败及其治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陈水生	学术月刊	定性研究	如何避免公共政策失败，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构建基于循证决策的整体性决策体系。
循证政策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的运用	循证在公共卫生政策中运用	循证决策：一种忠于证据的公共卫生决策模式	童峰，林移刚，张冲	医学与哲学（B）	定性研究	有利于提升科研创新的效率和指导公共卫生决策者决策。
		从情报风险到风险情报：循证视阈下公共卫生应急情报风险湍流感知	胡峰	情报科学	个案分析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结合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演化周期展开研究。
	循证社会工作	西方社会工作循证实践的反思性研究综述	张海，陈雨晴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定性研究	相关的反思性研究大致从逻辑—方法、权力—话语、管理—问责等三个维度展开。
		医务社会工作协同防控公共卫生事件的循证实践模式	童峰，拜争刚	社会建设	定性研究	倡导树立医务社会工作领域的证据观，促进中国医务社会工作证据的生产、转化与积累。
	循证教育	循证学校改革：美国基础教育改革路径探索	李华，程晋宽	教育研究	定性研究	美国基础教育循证学校改革业已形成“基于证据+循证干预+循证决策+最佳结果”理论模型。
		大数据时代循证教师教育实践	王争录，张博，吴尚燃	高教发展与评估	定性研究	提升循证意识，建立健全循证机制及循证库，营造“知、循、施、监”一体化循证氛围。

注：篇幅所限，仅展示部分代表性文献（资料整理自知网、谷歌学术和百度学术等）。

学科包容型结构也体现了循证实践的基础性研究、循证实践的医学应用性研究以及循证政策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思想，是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和理念。

（二）技术在循证政策中的运用机制

正如表1所示，从技术在循证政策中的运用机

制来看，国内学者主要运用定性研究的方式，探究技术、算法在循证政策中的运用。这一运用机制主要体现为技术赋能作用的发挥。其中，详细内容可归纳为三个部分：大数据技术的运用、算法的集成与整合、人工智慧的识别。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与迭代,循证政策与之紧密结合,并进一步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数据-信息-证据-实践”成为循证政策形成的基本思路。具体来看,从数据转向信息、将信息转化为证据、然后将证据运用到实践,这一过程分别对应大数据技术的运用、算法的集成与整合、人工智慧的识别,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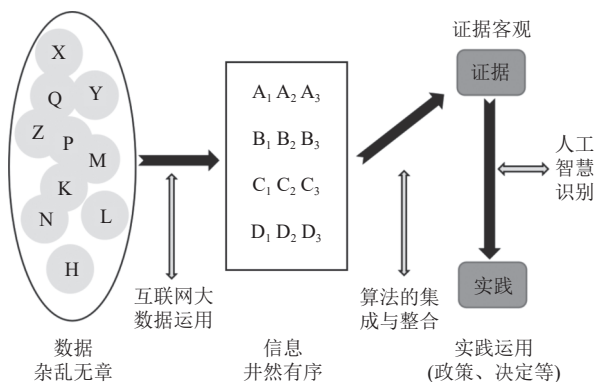


图5 互联网技术与循证政策结合的基本过程

1.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从数据转向信息

大数据技术为循证政策形成提供了科技支撑。数据是最底层的资源,并不是井然有序的,底层数据充满杂质,质量参差不齐。信息是加工过的数据,通常是客观的,不包含各种情感因素在内。正如图5所示,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繁杂无章的数据转向为井然有序的海量信息。海量的信息会加速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运行速度,成为一种良性的循环,从而进一步提高信息分析的精确度。不仅如此,这些信息还需要通过算法进一步加工,从中找出规律和脉络,从而让信息的作用充分发挥。不过,这一过程也同样需要各方进一步深思,例如:有学者对新媒体数据实证分析进行了哲学反思^[18],这也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给社会带来的思考之一。

2. 算法的集成与整合：将信息转化为证据

算法的出现为循证政策形成带来了便捷与实用。通过算法的集成与整合,井然有序的海量信息转化为可靠性较强、客观性较高的证据,或者说,转化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实践依据。相比人工计算,算法的集成与整合无疑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算法”的整合作用,其实质就是大数据的一种合成和转换,而海量的信息本质上就是一种循证政策证据,这种数据证据可以通过某种途径集合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形成基于“算法”整合的循证政策证据链条。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从这些信息中获取制定办法的依据,这样将有助于提升

政府循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此外,这一过程还要加强对数据法律问题的关注,例如:有学者从立法范畴、问题辨识和法治路径方面探究了政府数据开放与公共数据治理的内容^[19]。

3. 人工智慧的识别：将证据运用到实践

通过人工智慧的识别,将基于“算法”的证据链条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这种循证政策证据链条,可以探究各种领域的循证政策和决策。尽管算法的集成与整合可以将数据转化为证据,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仍需人工辅助。此外,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算法”证据的要求也不同。例如:法律领域的循证问题,需要通过大数据技术获取高质量的信息“证据”,辅助相关法律工作的开展,从而推动和实现循证工作的法治化。而公共政策领域的循证政策研究,则需要遵循“数据-信息-证据-实践”的基本逻辑,充分发挥技术对循证政策的优化作用,从而提高政策出台的科学性。

从数据转向信息、将信息转化为证据、然后将证据运用到实践,这一过程分别对应大数据技术的运用、算法的集成与整合、人工智慧的识别,这是技术在循证政策中的运用机制,也是循证政策形成的原理。总的思路是,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使得数据转向信息;算法的集成与整合,使得信息转化为证据;人工智慧的识别,使得证据运用到实践。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数据转向信息,再将信息转化为证据,然后将证据运用到实践,而在实践过程中有关人员也同样需要反馈数据和信息,从而进一步推动这一转化过程的实现。所以,这一思路并非只存在单向运行的情况,还蕴含着反馈、转化和助推的方式。

(三) 基于循证理论的政府管理问题

基于循证理论的政府管理问题,其决策制定和出台需要对证据进行进一步挖掘。例如,有研究通过介绍美国行政法、信息技术和统计分析的发展状况,探讨如何在证据的基础上创造强有力的新工具来促进环境政策的发展^[20]。基于循证理论的视角,学者通常运用定性比较、量化研究,以及理论研究与案例验证相结合的方式,探究政府管理的具体问题。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内容:证据分级方案、政府循证决策、调控优化过程。

1. 证据分级方案

为充分发挥证据分级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不仅需要设计出一套详细的实施方案,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严格遵守这一方案的基本规定。例如,在美国制订的“分层证据”社会项目中,严格的证据是

授予政府干预资金的决定性原则^[21]。借鉴医学领域国际较认可的“证据推荐评估、开发与评价分级标准（GRADE）”^[22]，本文认为循证决策的证据分级标准应当遵循重要性大小原则。借鉴医学最佳证据总结^[23]，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结合循证决策证据分级的实际，提炼出循证决策方案的最佳证据，并由公共政策领域的专家对获得的最佳证据进行进一步的整合，获得高质量的循证决策证据排列次序，最后按重要性进行详细分类。

2. 政府循证决策

为了进一步优化决策，政府应依据循证决策证据重要性进行决策并出台有关政策。在循证决策过程中，政府通常需要从专家、智库以及民众广泛意见中获取制定政策的基本信息（证据）。这种循证决策的理念可能有助于政府决策实现创新，正如有学者认为，循证决策理论的价值在于打破政策制定的陈旧传统，重构信息证据与公共政策的关系^[24]。总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循证决策应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有助于保障政策制定与出台的合理性。

3. 调控优化过程

对政府管理来说，循证政策是一个调控优化的过程。在这一优化过程中，循证理念在实践中的推广和运用，逐步从解决医学问题发展到解决政府公共政策问题。循证政策通过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得到授权，并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提供咨询意见等，以确保做到并做好^[25]。当然，政府决策也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这时地方各级政府需要对政策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发挥便民利民的作用。所以，地方各级政府在作出决定时，不仅要与国家大政方针保持一致，还要依据地方经济与民生的实际情况，对国家宏观方略作进一步细化，从而优化地方政策的制定与推行。

（四）循证实践在其他主要社会科学中的运用

正如表1所示，除了循证实践的医学应用性研究，循证实践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主要包括社会工作、教育学、公共卫生政策等，以质性研究为主、个案分析为辅，但缺乏量化分析。

1. 在循证社会工作中的运用

循证实践在循证社会工作中的运用，通常与实践反思性总结、医务工作内容和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等内容有关。其中，循证实践与社会工作相结合的研究有对西方社会工作循证实践的反思^[26]。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医务社会工作协同防控公共卫生事

件的循证实践模式^[27]。

2. 在循证教育学中的运用

循证实践在循证教育学中的运用，通常与学校、学生、教师、教学文化和教育政策等内容有关。例如：循证实践与教育学相结合的研究涉及的主题有循证学校改革^[28]、学前教育政策^[29]、循证教师教育实践^[30]等。其中，有学者研究了美国教学实践的循证化变革，指出其教学改革过程出现了“唯证据主义”倾向、教学过程的线性化、人文价值缺位等问题^[31]，这给我国循证教学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3. 在循证卫生政策的运用

循证实践在循证卫生政策的运用，多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结合。有学者通过对世界卫生组织循证文献进行扎根理论分析，探究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沟通的实践路径^[32]；也有学者基于循证视阈，探讨了公共卫生应急情报风险湍流感知^[33]；还有研究将循证决策视为一种忠于证据的公共卫生决策模式^[34]。这些研究从循证角度为应急防控与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启发。

三、主题框架

根据CiteSpace 6.1.R3软件可视化结果和研究文献编码结果，本文形成了一个循证政策研究范围的基本理论轮廓，并得出了一个循证政策的主题框架，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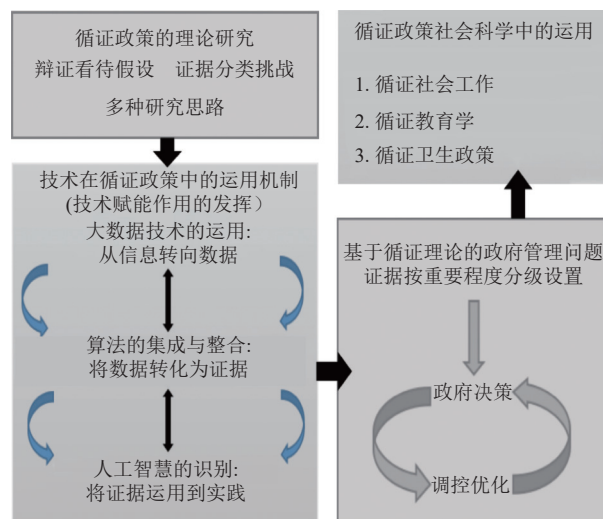


图6 循证政策的主题框架

循证政策的主题框架主要围绕两大问题，并分为四个研究内容展开。结合大数据技术，本文探讨了循证政策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技术如何影响循证

政策的过程,即循证政策形成的原理。其次,通过技术生成证据,成为循证实践,再如何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基于此,本文提出四个研究内容:(1)循证政策的理论研究,包括辩证看待假设、证据分类挑战、多种研究思路。国内学者还关注技术和算法赋能的作用,探讨在此背景下循证政策如何实现的过程;(2)技术在循证政策中的运用机制,即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中,“数据-信息-证据-实践”成为循证政策形成的基本思路;(3)基于循证理论的政府管理问题,包括证据分级方案、政府循证决策、调控优化过程;(4)循证实践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其中,其他社会科学指除了医学之外的学科。

四、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第一,循证政策的相关内容属于公共管理方法与理论的前沿领域,循证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循证政策的理论研究、技术在循证政策中的运用机制、基于循证理论的政府决策问题、循证实践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四个部分的有机结合,共同形成了循证政策研究的主题框架。

第二,循证政策形成的大致思路,即通过数据驱动与技术赋能生成,形成“数据-信息-证据-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并非只存在单向运行的情况,还蕴含着反馈、转化和助推的方式。另外,“循证实践”研究趋势主要是以循证医学为中心,向其他领域发散和拓展,形成研究范围的中心-发散式形态,成为一种跨学科包容型结构,该结构内核稳定,但发散的边界尚无固定界限。

第三,循证政策的主题框架主要围绕两大问题,并分为四个研究内容展开。结合大数据技术,研究首先探讨了循证政策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技术如何影响循证政策的过程,即循证政策形成的原理。其次,通过技术生成证据,成为循证实践,再如何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 未来展望

1. 政府循证治理:探索循证理念对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

探索循证理念对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即如何运用治理工具来完善和推行循证政策,从而积极推动理论与学术本土化,开展中国大地上的循证政策

研究。所以,本文认为可以将整体性思维融入我国政府循证治理研究中去,探索多主体共同参与式治理模式。多主体共同参与式治理需要的是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而如何形成共同的利益目标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政府部门之间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整体治理思维下探索多主体共同参与式治理模式,是一种利益之间的整合与协调。首先,将同一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界线打通,使得跨部门之间的合作得以实现;其次,将政府同一部门中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利益界线打通,实现跨领域之间的合作;最后,无论是同一领域的不同部门之间,还是同一部门中的不同领域之间,其人员的工作事项仍然要详细规定,不可一概而论。

2. 融入当地文化:探索如何推动循证政策的中国特色发展

探索如何推动循证政策的中国特色发展,其未来的研究难点主要是如何融入当地文化。在循证政策理念运用的过程中,充分融入当地文化是未来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例如,同一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同一部门、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都需要考虑各地复杂的社会条件和实际,并作出符合不同地区中居民思维的行动,以及出台相应的政策等。要扎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研究各地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从而充分发挥推行循证政策带来的作用。因此,探索如何推动循证政策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其核心在于倡导融入各地文化中去。

3. 技术赋能循证:探索如何运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循证政策发展

用发展的眼光和视野,在中国语境下探索运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循证政策发展。对此,本文认为需要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并正确使用和发挥技术的力量,不断助推循证政策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数据资料被广泛收集,同时这些原始的数据资料需要被进一步升级转换成信息,形成新的“证据”,再由“算法”整合成证据链。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实现循证政策的完善与发展,进而形成符合地方实际的政府治理创新方式,还有助于探索出各地独具特色的循证政策实现之路,从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创新体系。

4. 证据分级量化:探索如何对循证政策中“证据分级”问题开展定量研究

在循证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对循证政策中“证据分级”问题开展定量研究,可能是研究的难点之一,有待于未来进一步探索。学界对循证政策问题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缺乏案例实证

与定量分析,因此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可能具有更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循证政策问题的量化研究可能更多集中在证据的分级设置上面,即如何通过运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实现循证政策的证据分级,并提炼出符合各地实际的典型案例。此外,由于循证政策的“证据”也在不断地被更多数据资料丰富和充实,这也提升了证据分级量化的研究难度。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能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发挥循证政策的作用,也将丰富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知识体系。

注释

① 系统文献综述法对已涉及识别、评估和解释某一特定主题的初步研究,该方法要求研究人员使用更广泛的搜索策略、预定义的搜索字符串以及统一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参见Erkmen Ö. Data Journalism: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ism Studies, 2024, 25(1): 58-79.)

② 此处对系统文献综述法操作步骤的介绍,是对刘洋等(2020)、刘善仕等(2022)研究方法的概括。(参见刘洋,董久钰,魏江. 数字创新管理: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J]. 管理世界, 2020, 36(07): 198-217+219;刘善仕,裴嘉良,葛淳棉,等. 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理论探索与研究展望[J]. 管理世界, 2022, 38(02): 225-239+14-16.)

③ 通常,循证政策与循证决策这两个词经常混用,所以本文在此并不做过多严格区分。

④ 起初并未设定知网检索的时间范围,但通过检索发现实际发文时间为2000~2022年。之后,本文在校对完善过程中补充了最新的文献资料,例如参考文献[11]。

⑤ 为了探究国外学界的研究热点,所以文献检索过程中设定了“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两个条件。起初并未设定Web Of Science检索的时间范围,但在使用CiteSpace 6.1.R3软件后发现Time Frame为2012~2022(年)。其原因可能在于“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的设定,使得Web Of Science检索中剔除了2012年之前的文献。因此,为了确保研究的质量,本文在修改完善过程中补充了2012年之前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例如参考文献[16][17][20][25]。其中,相对较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例如文献[17][25])也补充到表1中,进一步完善了本文的研究内容。

⑥ 国内外循证政策的研究热点主要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获得。研究通过选定CiteSpace 6.1.R3软件中的“Keyword”按钮,将“year per slice”设置为“1”,网络裁剪类型设置为“Pathfinder”,其余默认,运行以后得到国内外“循证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如图2和图3所示。

⑦ 文献编码表格涉及方面有:“作者、文献来源、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和主题”,此处借鉴刘善仕等(2022)的编码方式。(参见刘善仕,裴嘉良,葛淳棉,等. 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理论探索与研究展望[J]. 管理世界, 2022, 38(02): 225-239+14-16.)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EB/OL]. [2016-05-1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7/c1024-28358052.html>.
- [2] 杨开峰,魏夏楠. 政府循证决策:美国联邦政府的实践及启示[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1(3): 139-149.
- [3] 高鹏飞,吴琼. 科学与决策的协同:新型政府循证决策模式构建与逻辑延伸[J]. 领导科学, 2021(6): 97-100.
- [4] 冯佳昊,陈安. 基于循证决策理念的智库证据分级与决策路径建构[J]. 中国科技论坛, 2022(5): 156-166.
- [5] 张红春,杨涛. 技术赋能循证:人工智能驱动政府循证决策范式变革[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2, 24(4): 44-56.
- [6] 曲纵翔,董柯欣. 以算法拯救循证:“知识—权力”结构下政策终结的话语空间[J]. 行政论坛, 2021, 28(6): 94-104.
- [7] 周曙光,王诗雨. 企业财务风险与产业结构调整循证决策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2(2): 174-183.
- [8] 杨岩,刘志辉,张兆锋. 基于循证决策理念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构建[J].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2022, 54(4): 90-101.
- [9] 陈水生. 公共政策失败及其治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J]. 学术月刊, 2022, 54(2): 91-102.
- [10] 张云昊. 循证政策的发展历程、内在逻辑及其建构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11): 73-78.
- [11] 尚智丛,刘源. 循证决策中“证据”的相对价值——基于全民减盐政策的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23, 41(12): 2147-2154.
- [12] 马小亮,樊春良. 基于证据的政策:思想起源、发展和启示[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3): 353-362.
- [13] OLIVER K, LORENC T, INNVÆR S. New directions in evidence-based policy researc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J]. Health Research Policy and Systems, 2014, 12: 1-11.
- [14] LA CAZE A, COLYVAN M. A challenge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J]. Axiomathes, 2017, 27: 1-13.
- [15] LAIBHEN-PARKES 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ompetence: a concept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Knowledge, 2014, 25(3): 173-182.
- [16] TRANFIELD D, DENYER D, SMART P.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developing evidence-informed management knowledge by means of systematic review[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3, 14(3): 207-222.
- [17] PAWSON R. Evidence-based policy: in search of a method[J]. Evaluation, 2002, 8(2): 157-181.

- [18] 龚培. 科学的镜像: 新媒体数据实证分析的哲学反思[J]. 浙江社会科学, 2022(9): 94-102+159.
- [19] 李涛. 政府数据开放与公共数据治理: 立法范畴、问题辨识和法治路径[J]. 法学论坛, 2022, 37(5): 65-73.
- [20] PASCUAL P. Evidence-based decisions for the wiki worl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tadata, Semantics and Ontologies, 2009, 4(4): 287-294.
- [21] BARON J. A brief history of evidence-based policy[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18, 678(1): 40-50.
- [22] 费宇彤, 柴倩云, 夏如玉, 等. 真实世界临床研究证据分级的思考与初步探索[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2, 22(10): 1206-1211.
- [23] 万妞, 童辉, 王李胜.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运动管理方案的最佳证据总结[J]. 循证护理, 2022, 8(13): 1719-1724.
- [24] 胡业飞.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循证决策——一个文献综述[J].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2017(1): 173-185.
- [25] CARTWRIGHT N. Evidence-based policy: what's to be done about relevance? For the 2008 Oberlin philosophy colloquium[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9, 143(1): 127-136.
- [26] 张海, 陈雨晴. 西方社会工作循证实践的反思性研究综述[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7(3): 44-59.
- [27] 童峰, 拜争刚. 医务社会工作协同防控公共卫生事件的循证实践模式[J]. 社会建设, 2022, 9(3): 53-63.
- [28] 李华, 程晋宽. 循证学校改革: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路径探索[J]. 教育研究, 2019, 40(10): 62-73.
- [29] 李静, 余瑶. 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向——基于“十三五”时期学前教育政策文本的分析[J]. 学术探索, 2022(3): 140-149.
- [30] 王争录, 张博, 吴尚燃. 大数据时代循证教师教育实践[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22, 38(3): 11-20+117-118.
- [31] 邹逸, 黄晓. 美国教学实践的循证化变革[J]. 比较教育研究, 2022, 44(9): 76-83+100.
- [32] 桂天晗, 钟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沟通的实践路径——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循证文献的扎根理论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1, 18(3): 113-124+174.
- [33] 胡峰. 从情报风险到风险情报: 循证视阈下公共卫生应急情报风险湍流感知[J]. 情报科学, 2022, 40(4): 79-89.
- [34] 童峰, 林移刚, 张冲. 循证决策: 一种忠于证据的公共卫生决策模式[J]. 医学与哲学(B), 2015, 36(5): 4-7.

Evidence-Based Policy: Research Content, Thematic Framework and Future Prospects

WANG Lei TIAN Hai-ro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evidence-based policies is currently at the forefront of public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heories.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cutting-edge issues in the research field,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is used to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evidence-based policy research. The main content of evidence-based policy research i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vidence-based policy, the applica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in evidence-based policy, the problem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evidence-based theor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other social sciences. Among them, the general idea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evidence-based policies, namely the process of “data information evidence practice”, is not only a one-way operation, but also contains ways of feedback,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hematic framework of 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probes into four research contents centering on two major issues. This paper further puts forward future prospect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government evidence-based governance, integrating into local culture, evidence-based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evidence grading and quantification. In summary,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is article lies in helping the academic community grasp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evidence-based policies.

Key words evidence-based polic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content; thematic framework; future outlook

编辑 朱娜